

报告文学概论

涂怀章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报告文学研究

中国写作研究丛书

报告文学概论

涂怀章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写作研究丛书

报告文学概论

涂怀章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洪湖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4插页 169,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统一书号：10106·903 定价：1.30元

《中国写作研究丛书》总序

臧克家

写作二字，经常挂在人们的口头上，听起来，很简单，追究一下它的意义而且实践起来，便会觉得很简单了。

一提写作，就会想到文艺方面去，这是很自然的。其实呢，它的范围广阔得多——除文艺写作外，还有许多为实用所必需的写作。当前，我国四化建设中，就需要各个门类的写作，例如：经济管理类文体写作、理工农医类文体写作、司法公文类文体写作等等。还有领导同志拟个报告，出席座谈会写篇发言稿，工作告一段落作个总结，科学家写篇论文，新闻工作者写篇报道，甚至友朋间信息往还，哪一点能离写作？

写作，用途宽广，人人离不开它。可见，积极开展写作学科的研究，其意义确实重大，它是一门值得提倡并必须予以振兴的学科，不能等闲视之。

当然，写作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譬如我们写完一篇

文章，重读一遍时，往往觉得辞不达意，笔下写出来的和心里想说出来的不完全一致。古人有句名言，曰：“辞达”。“辞达”，看来容易做到难！这需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十分熟悉，而高强的表现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文艺创作不用说了，就是说理性的文章，除了理论性之外，还要有艺术性，才能动人，使人乐于接受。不能写得“语言无味，象个瘪三”；也不要摆出一副架势，令人望而生畏，甚至生厌。为使文章生动活泼，富于魅力，“笑谈真理又何妨”？

譬如，同样对群众作报告，有的人的讲稿，群众听了，掌声雷动；有的人讲完后，全场哑然。这一轰动，一哑然，不纯乎是口才问题，也是个写作问题。

实用文字，好似按程式办事就成了，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写作技巧在这个方面毫无用武之地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有例可证。写家书，应该算是地地道道的实用文字了，但它在郑板桥手下就别开生面，写得风趣横生，文采奕奕，使人感到生动亲切，象读一篇又一篇小小的优美抒情散文，从中得到美感享受。

由此也就可见，我们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写作，文艺性质的，实用性质的，都必须讲求表现艺术，使写出来的文章不但“辞达”，而且富于鲜明的个性和斑斓的文采。这样，才能动人，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由中国写作学会负责编辑的一套《中国写作研究丛

书》，预计到一九八五年可以出版二十部左右。这套丛书，大都出于专家之手，它在文章原理、理论写作、文学写作、新闻写作和应用写作等几个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与探讨，这对于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会起到促进作用的；对于提高群众的写作能力，也会有所帮助。我想，这套丛书定会受到从事写作科研和教学的同志以及广大读者的欢迎。总之，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振兴写作学科，使之更好地为国家四化建设服务，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因而乐于为它写了千字小文，抒发一点短见，以此为序。

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自序

撰写一部著作的起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时代的召唤，斗争的需要，事业的吸引，诗书的启迪，师长的鞭策，友人的邀约；抑或环境的熏染，感情的冲动，兴趣的勃发，精神的寄托；甚至名利的诱惑，生活的逼迫，等等。这些，在不同阶级、不同国度的作家和学者中，均可找到例子。那么，拙著《报告文学概论》的来由是什么呢？我记起文学导师鲁迅的《〈呐喊〉自序》的写法，不妨也象先生那样，从较远的年代说起。

我出生在长江边一个乡村手工裁缝的家庭。往上数，几代人没读过书。可喜的是，我逢着了美好的时代。当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智力刚到可以接受文化知识的程度，就背着书包上学校了，而且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说实在的，我对新中国怀有特别感激的心情。因此，当我懂得写作基本知识之后，就开始学习创作，立志用作品“感恩”，赞颂这个时代。后来，才懂得文学艺术的本质和职能。不过，我出身贫寒，家里人没有水平辅导我学习，更不可能得到名人的指点和荐举，只好埋头读书，勤奋思考，从退稿中总结教训，苦练基本功。记得年轻的时候，阅历不够，语言不丰富，动手就写长文，结果，稿件礼花般地喷射出去，雪片般地飘飞回来。不久，我降低标准，改变策略，写小消息、短通讯、读后感、杂文，参加报刊的“问题讨论”，终

于见效。先是发表“豆腐干”，继而刊登“小手帕”。写了一段时间，文句日渐流畅，技法也有提高，居然也能做出小说、散文和评论来，竟在报纸上偶尔享有一整版的“席位”，或于杂志中得到好几页的“地盘”了。诚然，我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做学问上却获得了宝贵的体会：刻苦勤奋，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决不会一事无成。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努力比什么条件都重要。只要意志永远不垮，在稿件质量上狠下功夫，写作上就会有进无退。

现在有的青年，一开始就想写大部头，或发誓“一生搞小说”、“专攻论文”等等，却忽视了基本功的训练。退了几次稿，往往又灰心丧气，怨天尤人。有的埋怨自己不是出身“书香门第”，无名师指点；有的责怪编辑，说他们“只瞧得起名人，不肯照顾无名小卒”。于是，到处找关系，钻门路，请求引荐。我在大学教书，曾经非常同情这样的青年学生，帮助不少人推荐过稿件，有时带他们到编辑部去，甚至将其不成熟的习作删改后给报刊发表。可是，有的学生毕业后跑回来向我倾诉苦衷，十分懊丧。原来，他们并没有掌握过硬的本领，参加工作后独立执行写作任务，一次也完不成。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一把锄头和种地的方法，比两个馒头重要得多。重要的是应该授予劳动的工具和教给真正的本领，而不是施舍一点充饥的食物。青年人学习写作，切勿只求发表一两篇小文章，而是要真正学到“战略战术”，练出过硬的功夫。一两篇小文章的刊载，只能带来暂时的荣誉，而过硬的基本功，却可以供你一辈子不断地作出学术研究或创作上的贡献。出身“书香门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得到名师指点和推荐，固然很好，有时能及时发扬优点，纠

正偏向，促使自己快快成长。但是，不可能每个青年都能得到如此优越的条件。就是有这样的条件，也决不能放松基本功的训练；否则，也是不能有大作为的。我们应当懂得：每一位名人，在他发表第一篇甚至若干篇文章之前，也是“无名小卒”。当他有一篇或几篇超出了众人，便以这种成就引来了信任。此后，或许偶有写得并不出色的文章，也会因其“大名鼎鼎”而被优先发表，这是并不奇怪的。青年写作者不要老是盯着他们现在的“优越条件”牢骚满腹，而应该效法人家成名前的艰苦努力直至呈献出惊人的成果。就编辑部而言，受不正之风的侵袭是可能的，但是，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是论质取文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写过多年的作者，把关也是极严的。眼下，无论是报刊还是出版社，从我接触的编辑来看，他们都迫切希望发现新人新作，盼望有“打得响”的文章推动他们的工作，为他们的劳动赢得荣誉。所以，初学写作者不要成天盯着那些质量一般的文章说：“我的跟它差不多，为什么不发表？”而应该埋头苦干，拿出远远超过一般水平的佳作。我感到，发现人才、重视人才的春风正在吹拂着祖国大地，倘若你攒足力气，有一天猛地推开了“优质”之窗，你便逢春了！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写作过程中，要不断地跟“惰性”作斗争。“看花容易绣花难”。人们看到报刊上的小文章，如非惊人之作，读过之后，往往随手弃之，十分轻视。其实，如果你亲自动手试试看，定会感到异常艰难。一篇极短的普通文章，内部也有“起、承、转、合”，种种道理，决非可以随便写成。别人的感受我不清楚，以我自己来说，初学写作的时候，每写到一半，就感到十分吃力，

而且总是担心：这些文字有没有用呢？费尽心血，也许根本发表不了。此时，总象有股什么力量把自己往后拉，不想干了，这就是“惰性”。但是我想，如果半途而废，结论只有一个：肯定不会发表。没有文章嘛！倘若坚持写完，就会多一个可能性：发表。道理很简单：只有干完，才能收效。于是，我咬咬牙，继续写下去。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记不清是哪一位伟人说的了，生活好比海洋，人是一艘航船。不管航船怎样颠簸，它的旗帜总是应该高高飘扬。我以为，这面旗帜就是事业心，也可以叫做“理想”。因此，即使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年大风浪”中，我也没有放弃悄悄地读书和写作。当报纸文艺副刊和一些杂志刚刚恢复，我就又发表文章了。大约是这些“产品”使师友们认为我可以独立操作文章的生产，于是有一天，湖北日报社罗运筹同志给我“特约记者介绍信”，并用车把我送到东湖之滨的水生物研究所，嘱我为省首次科学大会采写一篇报告文学。写这种体裁，对我来说也是首次，我不禁有些惶恐起来。好在当时全国正掀起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我便从阅读作品入手，认真采访，仔细摸索，在省委宣传部和报社许多同志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让祖国江湖珍宝永放光彩》。此后，又有《长江文艺》、上海《少年科学》等刊物约我，接着写了几篇。一九七九年初夏，在武昌举行全国性的报告文学讨论会，正值我的报告文学《生命的春风》和传记文学《陈潭秋的故事》分别在《长江文艺》和《武汉文艺》（现名《芳草》）发表，长江日报社周代同志在会上约我写谈体会的文章。会后，我便开始研究报告文学理论，首先写了《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战斗作用》在报上发表，接着

总结自己实践的过程，写了数万字的《报告文学的采访和写作》。本拟加以丰富后出版，但旋即忙于筹备成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会，赴各地大专院校和文联联系工作，并负责编辑内部刊物《报告文学通讯》，一直无暇动笔。不久，参加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该社和穆熙同志约我和几个同事合写一本《报告文学基本知识》，我便将那几万字奉献出去，他看过之后，曾给予充分肯定和鼓励。后因执笔人太多，许多方面难以统一，书未出成。其间，在我身边工作的青年助教要求“学习和备课”，又借去过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张慕勋同志知道此稿后，十分关怀和支持，要去在《光明日报通讯》上发表了一些章节。后来，我也曾受省委派遣，和其他作家一道到大别山区、武钢〇七工区采写过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却一直未能挤出时间整理理论著作。

一九八二年，中国写作学会在南方开会，筹划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写作研究丛书》。会议一结束，学会理事、丛书执行编委王序平同志即热情地来向我约稿。这不是一次平常的约稿，它在我心中刻下了难忘的深情。因为，当时我正处在极度困难的逆境之中。我是个读书人，笃信书中的真理，曾经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过本单位原个别负责人搞不正之风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说我“有严重问题”，“将要在党内受到处分”等等，并且利用私人关系将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另一部专著的校对工作弄得“搁浅”了。有的作家不敢跟我写信，有的编辑不敢向我约稿。然而，当我讲明这一切以后，序平先生仍然帮助我拟定提纲，极力鼓励我写下去（后来，又再三替我修订原稿）。我为他的正直无私而感动，为他的信任和援助

而勇气百倍，愉快地承担了撰写《报告文学概论》的任务。接着，我向省出版局党委报告了另一部专著受阻的情况。在出版局副局长于溪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很快排除了干扰，使那本作家研究专著得以问世。

这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充满信心来写《报告文学概论》。在研究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注意了这么几点：

第一，不贴政治标签，不用政治理论代替学术结论。

长期以来，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混为一谈。过去，不少学术著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被上纲为政治立场问题，以致作者挨批遭斗，甚至锒铛入狱的都有。如此一来，又出现了另一种不良倾向，不少学术著作乱贴政治标签，或干脆从政治的角度进行研究、归纳，把学术性的内容几乎抽空。我手头就有这样一本教材，谈到新闻的采访方法时，写道：“（1）必须具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2）一定要抱着严肃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进行采访。（3）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4）应当发扬艰苦、细致、深入的作风……”这些内容当然是对的，对作者也应该提出，但仅仅有它是不行的。它能解决具体的写法和技巧问题么？不能。政治对于各种学问都会有影响，特定时代的学术研究必然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不用说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特征的报告文学了。但是，决不能用政治理论代替学术结论。因此，我在这本书中，对于“报告文学作者的胆略”等内容，未作专章论述。

第二，着重研究写作实践过程，总结具体的技巧和方

法。

我以为，理论专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有多少“理论”，更重要的是它有多少能够指导实践、行之有效的理论。因此，在谈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历史渊源和社会作用时，我用的文字不多。而讲述写作技巧，则用了大量的篇幅。我曾听到有的文学青年这样说：“世界上，不同版本的写作知识、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和书籍，浩如烟海，可惜讲概念、各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求的多，谈具体写法与技能的少。读起来似乎也能理解，用起来则是另外一回事。”还有的青年讲：

“我发现，听那些专门从事评论的人谈写作，对于分析、理解、欣赏作品有好处；听那些从事创作实践的人谈写作，感到对于自己的写作有帮助。”这话是引人深思的。它告诉我们：搞理论的人应当重视实践，最好能亲自进行创作实践。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会更有实用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和森同志出版了长篇小说，同时又研究文学理论，不是作出了好的榜样么！自然，我们也希望作家从事理论研究。尤其是那些老作家，经过数十年苦心实践，是有许多真知灼见的，是有管用的写作经验的。我这本书，就是想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大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趣，陆续写出一些富有实用价值的理论著作来。

第三，重视对作品的研究和探讨。

作品是文学理论的基础，没有作品就没有文学理论。过去，在部分大专院校，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创作没什么了不起，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算什么学问？写论文才真有水平哩！”因而，一篇“读者来信摘登”，往往被称赞为“很有学术价值”；一篇评论作品的短文，可以成为晋升教授职称

的申报材料，更不用说成系统、有见解的长篇论文了。其实，这种看法和作法是欠妥的。判断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是否有价值，不能光从体裁上看。我听到过这样的争论——有的搞创作的同志，瞧不起搞评论的人，说：“你不过是我身上的‘木耳’、‘菌子’、‘寄生虫’，评了几篇作品，就神气十足。一部《红楼梦》养活了多少人！考证一块大观园的瓦片吧，瓦片等于一顶教授桂冠！”搞评论的同志则反击：“你的作品能跟《红楼梦》比吗？听几个生活故事编成书，决不算什么学问。种地做工的也能搞创作！”前者则又反驳：“阁下的评论能跟茅盾的文章比吗？……”其实，看法都是片面的。作品、论文都可以有价值，也都可以没有价值，关键看其内容实质如何。作家和教授，都有学问；在某些方面，也都可能没有学问，关键看有无真才实学。高尔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作家研究生活中的人，好象采铁矿的，并要从矿石中炼出铁。评论家研究作品中的人，对已经炼出的铁进行鉴定，哪些可以做锄头，哪些可以做镰刀。那么，谁伟大呢？缺一不可。

至于有的院校的部分人，由于不能正确认识上述问题，发展到轻视写作教学，那就更可笑了。作品，是整个语言文学的基石，是文艺理论家登上研究高峰的台阶。写作，是表达一切科学成果的重要方式。在大学文学系，谈起中外文学史、语言知识等，都能知道，并能作些讲解，这固然重要。但是，离开了作品，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一切文学研究，都是为了推动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作品是本，理论是末，本末不能倒置。当然，写作教学不仅是讲授作品的创作，还要讲理论写作、新闻写作和应用写作等等。可以这样说，检验一个文学系学生是否有才学，请他写篇文章就足以了解。毫无

疑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世界观、阅历、生活面、知识面、认识水平、分析方法、艺术素质和文法基本功等等。文学系的学生如果不能写作，就象学了某种外国语而不能会话。其实，那些以为只有研究高深的理论才算有学问的学者，本身不也应该懂得写作么？否则，其研究成果如何表达呢？所以，我在写这本书时，对于中外古今的报告文学作品都是认真阅读的。我把那些作品的作者都引为自己的老师，这本书不过是学习他们的作品的体会罢了。

第四，研究的时候，对名家和非名家的作品一视同仁。

在撰写这部专著之前，我也曾读过不少文学理论著作。读多了，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即人们选为例子的多是名家作品。有些谈写作的书，几乎全部以《红楼梦》的写法为例，鲁迅的作品也为许多论文和著作反复讲析过。还有那些中外文学史上引用过的作品，长久以来，被翻来覆去地研究，从各个侧面发掘其特点，文章多得不计其数。这虽然是必要的。但我觉得，也应该扩大研究范围。有的作者，尽管名气不大，或者没什么“名”，然而，只要其作品中有可取之处，也是应该提出来研究的。我的观点是：论质录用。材料为观点服务。只要其特征、技法有利于总结写作规律，哪怕只有一个细小地方有价值，也应选用。

第五，吸取各种营养，提出自己的见解。

在从事理论研究前，必须大量读书，吸取多种营养。研究之后，又要跳出别人著作的圈子，提出新的见解。

一切好的书，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都是特定生活经验的总结。人家花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积累、思索、写作、修改而得到的成果，我们只要花几天、十几天时间就能读完，

就能吸收其中的营养，这是非常合算的事，何乐而不为呢？诚然，写作要了解生活，进行体验、思考，但是，不读书，光凭生活体验然后冥思苦想，是不行的。据说，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生活在深山老林，他经过长期的刻苦钻研，制造了一辆木制脚踏车，非常高兴，村人都赞扬他了不起，他也认为这创造“天下第一”。可是，当他有一天来到山外，看到了汽车，大吃一惊，深深感到自卑了。设想，如果他在已经掌握汽车的特点的基础上，再进行研究和创造，其成果将是何等可观！这说明，干任何事，要选择一个高的起点，要在前人铺设的基础上建树功业。而前人的种种经验，大都记载于书中。因此，我们读书，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认识世界，必能看得远，有作为。我们应该象大海吸收千江万河那样永不满足地吸取各种知识。

不过，读书人有两种。一种有“学”无“识”，书读得多，提起什么来，知道一点，做卡片可以，抄注释可以，没有自己的见解，写起文章来，只能综合、贩卖人家的观点。一种是有学有识，读书的数量不一定比前者多，并不对每本书都作笔记和卡片，但能抓住重点，分析归纳，能以前人的知识作“起跳板”，用正确理论指导自己认识生活，提出新见解。那么，我们读书，当然要作后者，要注意书中的独特见解，努力使自己成为有识之士，学以致用。

这本书的写成，是许多师友关怀和支持的结果。除前面说的外，还有第二章的内容，由于史料的特点决定了它的真实性要求，因而参阅了林非、田仲济等先生的文章。很早以前，《红旗》杂志社友人杨如鹏将他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的文章寄来，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碧

野、王陆才、王敬文、李德复、杨江柱、李楠父、侯宇、陈东华、钟静、赵致真、曾德厚等许多教授、作家和干部，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令我永远难忘，谨此一并致以谢忱。

最后特别要提出的是，在我的科研遇到种种干扰和阻力时，曾直接得到中央党报、中共湖北省委、省纪委和武汉市委、市纪委的关怀。我多次会见省市的好几位书记、部长和处长，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后来又受到中央一位老革命家的具体帮助。他们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我想，对那种患极左病或意识不健康的干扰学术研究的个别人，我们可以在宽阔的胸襟中忘掉他，但应该永远铭记那些关心知识分子疾苦、保护科学研究的党的好干部。可惜由于他们的职务和工作的重要性，暂时不便写出姓名道谢，但我想，以后总会有写到他们的时候的。……

总之，这本书凝结着党的亲切关怀、师友珍贵的情谊和前进道路上的艰辛。我感到，有必要将这些告诉广大有志于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的青年，让他们从中悟出一点人生的和写作的哲理，因此写了以上的话，作为序。

涂怀章 一九八四年冬于湖北大学